

中唐傳奇文「辨體」

——從「陳寅恪命題」出發**

陳 珏*

摘要

詩歌與傳奇文，有唐代文學二奇葩之譽，但學術界對唐人傳奇文認識的深度和廣度，至今仍遠不如唐詩，甚至還不能給傳奇文提供一個為大家所普遍接受的定義。

眾所周知，現代眼光的唐代傳奇文整理，始於二十世紀的初葉，由魯迅和汪辟疆發端，陳寅恪出題，列出了兩張「經典書單」(list of canonical works)——一張排除中唐「古文家」的作品，另一張則包括他們的作品——後來研究唐代傳奇文的專家，或循魯、汪之途，或由陳公之徑，或調和於二者間，為新世紀的學術界，進一步廓清唐代傳奇文的文類特徵，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標示了明確的出發點。有鑑於陳派「書單」之理論內涵，尚遠未窮盡，而陳寅恪所命的「古文與傳奇」之題，乃研究關鍵，以此為軸心，本文將著重探索它的潛在意義，擬從觀察初唐傳奇文和中唐傳奇文有何不同入手，起點則採取辨別體式的角度，故謂之「辨體」。討論中心在於探索陳寅恪對趙彥衛「史才、詩筆、議論」之說的一個創造性和顛覆性的闡釋，它存在於傳奇文之中，存在於「古文」之中，也存在於詩歌之中，與其說是一個文體意義上的模式，不如說是一個思想史意義上的模式。從此出發，論述中唐傳奇文的成型，其關鍵之一在「文備眾體」的「異質化」敘事現象，通過一系列特殊的章法，織成了一張「寓意」之網。

關鍵詞：傳奇文、古文、巴赫金、唐代、陳寅恪

收稿日期：2006年12月1日，通過刊登日期：2007年10月1日。

* 作者係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 本文初稿蒙《漢學研究》的兩位匿名評審人提出修改的意見，特此致謝。

一、緣起

詩歌與傳奇文，有唐代文學二奇葩之譽，此說雖為古往今來之眾多的文人學者所共識，但唐人傳奇文的研究討論，歷來遠少於唐詩的研究討論，亦一不爭的事實。可以說，學術界對唐人傳奇文認識的深度和廣度，仍遠不如唐詩。至今，學術界甚至還不能給傳奇文提供一個為大家所普遍接受的定義。

眾所周知，現代眼光的唐代傳奇文整理，始於二十世紀的初葉，由魯迅和汪辟疆發端，¹陳寅恪出題，²列出了兩張「經典書單」(list of canonical works)——一張排除中唐「古文家」的作品，另一張則包括他們的作品——後來研究唐代傳奇文的專家，或循魯、汪之途，或由陳公之徑，或調和於二者間，而貢獻甚卓越者，有劉開榮、祝秀俠、王夢鷗、內山知也、近藤春雄、程毅中、李劍國、周紹良、卞孝萱諸氏。³他們的研究，為新世紀的學術界，進一步廓清唐代傳奇文的文類特徵，奠定堅實的基礎，標示了明確的出發點。

二十世紀的文學史家，習慣把唐代的傳奇文發展，劃分為初唐傳奇文、中唐傳奇文和晚唐傳奇文三部分，形成一個「史」的框架。然而，在這一個框架中，二十世紀的學界也留下一系列有待探討的關鍵問題，需要進一步分門別類，作個案研究。比如，唐代傳奇文的發展之初唐、中唐和晚唐的階段既然已確立，線索似乎非常清楚，毋庸置疑。然而，如再試深入設問，這三

1 上世紀的二十年代，是現代意義上唐人傳奇文研究的開端。1927年魯迅《唐宋傳奇集》和1929年汪辟疆《唐人小說》的出版，確定了現代學術界研究唐代傳奇文的「經典書單」，規劃出研究的範圍，至今仍莫能外，故謂其發端。有關這一點的討論，詳參陳珏，《初唐傳奇文鉤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初版，2006重印），頁37-41。

2 上世紀的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是現代意義上唐人傳奇文研究的深入階段，其標誌為陳寅恪通過一系列論文和著作，提出了一個至今尚未解開的命題：古文運動的勃興與傳奇文崛起的複雜關係。陳先生把中唐傳奇文的崛起，置之於當時文化史的脈絡中考察，而所出之題，歷久常新，仍有待繼續探討。

3 此處略舉數重要學人之例，挂一漏萬，在所難免。又，排名以諸氏之代表著作的出版年份為序。

階段各自的文類特色，究竟為何？它們的發展，是一脈相承，還是各有其條貫，甚至互相有深刻的區別？凡此種種，都沒有一個答案。

由於問題的錯綜複雜，我的傳奇文研究，取按部就班的方法，從初唐開始，其初步成果，略見《初唐傳奇文鈎沉》一書。然而，中唐是傳奇文臻於全盛的黃金時代，名家輩出，寫作的動機與筆法，交融於變化多端的社會、思想和文化潮流中，殊難把握。面對比初唐複雜何止於十倍的中唐傳奇文研究，千頭萬緒，何處著手？

有鑑於二十世紀的傳奇文研究，或從魯迅、汪辟疆的「經典書單」出發，或從陳寅恪的「經典書單」出發，而尤其陳派「書單」之理論內涵，尚遠未窮盡。上述陳寅恪所命的「古文與傳奇」之題，乃研究關鍵，以此為軸心，我將著重探索它的潛在意義，擬從觀察初唐傳奇文和中唐傳奇文有何不同入手，起點則採取辨別體式的角度，故謂之「辨體」。

為縮小研究的範圍，便於討論的展開，此處所說的中唐傳奇文，主要是指單篇而言。下節先從學術史的角度，對中唐傳奇文中的「口傳體」與史筆問題，作一簡單的回顧。

二、「晝宴夜話」與「史筆」

陳寅恪所出之題，中心為中唐傳奇文與古文運動的關係（此題與傳奇文的章法有密切的關係）。

中唐傳奇文的作者是何等樣人？而其讀者又是何等樣人？這兩個問題，看似簡單，實際上極其複雜，可以說是揭開一系列中唐社會史和文學史上其他重大問題的關鍵之一，也是陳寅恪出題的中心。二十世紀的學術界，關心過這些重大的問題，它們包括：中唐傳奇文的崛起與「古文運動」的出現有沒有因果關係？⁴中唐傳奇文的崛起與唐人之行卷有沒有關係？⁵中唐傳奇文

4 「古文運動」與傳奇文崛起有關的說法，其中脈絡，十分複雜，有待研究，本文中亦不時有所涉及，詳後各節。

5 我在《初唐傳奇文鈎沉》中，曾經對此有撮要的背景介紹，詳參該書，頁44。又，英文討論此問題甚詳者，參Victor Mair（梅維恒），“Scroll Presentation in the T'ang Dynasty,”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38.1 (1978): 35-60.

的崛起和當時的口傳和筆錄的敘事傳統的變化有沒有關係？中唐傳奇文的崛起，與當時的文人集團——如韓愈集團和白居易集團——有無牽連？⁶

凡此種種，至今仍眾說紛紜，還遠遠沒能夠有一個為學界所普遍接受的答案。

對這類問題的探索，始於宋人，或認為唐代傳奇文是一種行卷的文體，作者是試前的舉子，而讀者是主試的考官。所謂行卷也者，即作者在考試之前，或通過關係，或直趨其門，先將私作呈考官過目，意在逞才，加深考官之印象，左右判卷時取捨之心理。若此說有據，那麼傳奇文做得好壞，事關行卷是不是能成功，而行卷是不是成功，在一個人的仕途上，具有非常的實際意義，對於一個前途未卜的應試者來說，有時候甚至可以是一件關乎一生的事情。請看趙彥衛《雲麓漫鈔》中的名言：⁷

唐之舉人，先藉當世顯人，以姓名達之主司，然後以所業投獻；踰數日又投，謂之「溫卷」，如《幽怪錄》、《傳奇》等皆是也。蓋此等文備眾體，可以見史才、詩筆、議論。⁸

如果其作意為行卷，而作者和讀者又是試子與主試雙方，則傳奇文代表一種特殊的干謁行為。⁹

按照這派的說法，「溫卷」的傳奇文要得到考官的青睞，必須具備哪些要點呢？正是上引趙彥衛的那段話中，透露出他所理解的傳奇文的三個關鍵要點：即史才、詩筆、議論（此說正是陳寅恪出題之基點，詳參本文以後諸節）。只有在這三方面的表現，卓爾不群，才有可能獲考官注意。可想而知，如此說成立，那麼傳奇文的作者，需兼通史、詩、論三者。然而，史文有史文之法，詩筆有詩筆之律，而議論亦當有議論之規。¹⁰那麼，傳奇文章法，

6 主張其中有牽連且早期即提綱挈領地提出者，乃是陳寅恪。此早期的論斷，後來逐步地醞釀出所謂的中唐傳奇文的白居易集團說和韓愈集團說，詳參本文第三節。

7 趙氏此說後頗有爭議，一方面為當代的一些學術界人士所引用，另一方面為當代的一些學術界人士所質疑，打開了一扇繼續探討唐傳奇文的文類特色之門，現在還遠未到結案的時候。

8 宋·趙彥衛撰，傅根清點校，《雲麓漫鈔》（北京：中華書局，1996），頁135。

9 唐人干謁的一般情況，參薛天緯，〈干謁與唐代詩人心態〉，中國唐代文學學會、西北大學中文系、廣西師範大學編，《唐代文學研究》第5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頁1-16。

10 這裏的「文備眾體」一說，學術界引用頗多，如孟昭連，〈唐傳奇「文備眾體」的藝術體

是不是史文之章法、詩律之章法和議論之章法的一個簡單合併，還是另有一種統率此三部分的整體章法體系？這個問題，至今尚無人有深論。

而且，在今天能夠見到的唐人文字中，似乎找不到直接而明確肯定這一種說法的證據。相反，在唐人的筆墨中，常常透露出以下的資訊：中唐傳奇文，並不是文人關在書房裏閉門造車的作品，而是在宴聚閒談時，根據聽來的故事所作的紀錄。此乃不少中唐傳奇文作者的「夫子自道」。這「夫子自道」，似乎在告訴我們，傳奇文是中唐特殊的文人圈中的一種特殊通訊工具，在徵集軼聞的外衣下，交流當代的社會和人文資訊，批評政治，臧否人物。幾乎所有的中唐成熟期單篇傳奇文，都或多或少有一個共同的「外部結構」：故事乃作者從別人處聽來，因「如是我聞」，而「姑妄言之」。這一種「如是我聞」的「外部結構」，多託之「晝宴夜話」，以朋友相聚，一人說故事，大家聽講，作者偶錄之的形式出現。當然也有更直截了當的「一對一」傳達方式。無論如何，其基本模式，有「說者」、「聞者」和「記者」三個維度。

這種方式在傳奇文中的最早出現，當推大曆末陳玄祐之〈離魂記〉，時在中唐傳奇文的開創階段：

玄祐少常聞此說，而多異同，或謂其虛。大曆末，遇棗燕縣令張仲規，因備述其本末。鑑則仲規堂叔，而說極備悉，故記之。¹¹

而其較早的繁複形式，似乎可由作於建中年間的沈既濟之〈任氏傳〉，作為代表：

建中二年，既濟自左拾遺與金吾將軍裴冀、京兆少尹孫成、戶部郎中崔需、右拾遺陸淳，皆謫居東南，自秦徂吳，水陸同道。時前拾遺朱放，因旅遊而隨焉。浮潁涉淮，方舟沿流，晝燕夜話，各徵其異說。眾君子聞任氏之事，共深歎駭，因請既濟傳之，以志異云。¹²

與〈離魂記〉和其他較簡單的同類結構相比較，這裏的沈、裴、孫、崔、陸、朱，既有名有姓，謫居途中，旅行路上，時間地點與環境，亦言之鑿

制〉，《南開學報》2000.4: 62-68等。然而，此說的內涵，究竟為何？值得繼續作深入研究。

11 見汪辟疆，《唐人小說》（上海：神州國光社，1932），頁44。

12 同上註，頁42。

鑿，有板有眼，寫得頭頭是道，不容人置疑。這樣的「姑妄言之」，至少也已達到「既以傳信，亦以傳疑」的境界了。

此後，在貞元、元和間的中唐傳奇文之黃金時代，¹³ 這種外部的結構形式，非常流行，或簡或繁，以種種變體，貫串於諸多名篇中。例如，貞元年間李公佐之〈南柯太守傳〉、¹⁴ 〈謝小娥傳〉、¹⁵ 〈古嶽瀆經〉，¹⁶ 乃至〈廬江馮媪傳〉諸篇；¹⁷ 又如，白行簡之〈李娃傳〉，¹⁸ 李吉甫之〈編次鄭欽悅大同古銘論〉等。¹⁹ 至元和年間，則有李朝威之〈柳毅傳〉，²⁰ 元稹之〈鶯鶯傳〉，²¹ 陳鴻之〈長恨歌傳〉，²² 陳鴻祖之〈東城老父傳〉，²³ 沈亞之之〈異夢錄〉、²⁴ 〈秦夢記〉，²⁵ 韓愈之〈石鼎聯句詩序〉等。²⁶ 從以上舉例，可以看出，整個中唐的傳奇文中，沿用此外部結構者，林林總總，比比皆是，直到晚唐傳奇集中，例如大和與開成年間李復言之《續玄怪錄》，猶迴響不絕。

由此可見，「晝宴夜話」的「如是我聞」之形式，的確是該文類一種典型的外部結構的體制。此外部結構旨在說明，傳奇文中的故事並不是作者的獨創，而是記錄自一則聽來的新聞。據此，是不是可以認為，中唐傳奇文的主框架之一，來自於當時說故事的藝術，或者至少是文人間的說故事藝術？若如此，則與上述趙彥衛所稱，相去遠矣。

13 中唐傳奇文之黃金時代的重要單篇傳奇文目錄，參李宗為，《唐人傳奇》（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201-203。

14 見汪辟疆，《唐人小說》，頁109。

15 同上註，頁113-116。

16 見王夢鷗，《唐人小說研究》二集（臺北：藝文印書館，1973），頁193。

17 見汪辟疆，《唐人小說》，頁122。

18 同上註，頁131-132。《李娃傳》之撰作年代，略有貞元十一年（795）說（據《李娃傳》之自述），貞元二十一年說（據戴望舒說），元和十四年（819）說（據卞孝萱說）等等，此處姑直從故事中自述的「晝宴夜話」之時間，並非撰作之考證。

19 見魯迅校錄，《唐宋傳奇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譯註本），頁57-58。

20 見汪辟疆，《唐人小說》，頁74-75。

21 同上註，頁192。

22 同上註，頁154。

23 同上註，頁146。

24 同上註，頁227-228。

25 同上註，頁231-233。

26 見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影印本），卷556，頁5630-5631。

其實從「晝宴夜話」的形式，並不能說明「如是我聞」的外部結構，就一定是出自於通俗文化的影響。相反，卻很可能是一種故意的修辭手段，代表文人的狡獪精緻雅文化。具體地說，印刷術和新聞紙不甚發達的當時，這種形式很可能是為特定文人圈提供用曲筆來評論時事的論壇，²⁷ 其中或深有寓意，不可不從字裏行間求而得之。研究的起點，我們從古文的史筆與「如是我聞」的外部結構來開始。

三、中唐傳奇文中的「史筆」與「古文」的文體

先看「古文」的史筆。中唐單篇傳奇文的黃金時代，既在貞元、元和之朝，而中唐韓柳的「古文運動」，也出現在約略同時。²⁸ 傳奇文的崛起與「古文運動」的出現，有何關係？人們對這個討論了數十年的問題，莫衷一是。有人認為，傳奇文受「古文運動」的影響。也有人認為，事實相反，「古文運動」受傳奇文的影響。然而，無論是何家何說，很少有人曾注意到，上節中重點分析的中唐傳奇文的這一種「如是我聞」的外部結構，稍變其體，也大量出現在當時的「古文」代表作中。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雖然這裏無篇幅深入去分析這一個複雜的問題，但從韓柳古文的名篇中稍舉數例，其外部結構大致相同之處，則歷歷可見。先看柳宗元作於永州時期的〈段太尉逸事狀〉：

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馬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上史館。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邠、虢間，過真定，北上馬嶺，歷亭鄆堡戍，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校無疑。或恐尚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私狀於執事，謹狀。²⁹

這裏，形式與「晝宴夜話」或稍異，採信於「如是我聞」則無二。其援永州刺史崔能之來，坐實其事，與前節引沈既濟〈枕中記〉援「金吾將軍裴冀、

27 參陳珏，《初唐傳奇文鈞沉》，頁41-57。

28 參孫昌武，《唐代古文運動通論》（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4），頁82-99。

29 見《全唐文》，卷591，頁5977。

京兆少尹孫成、戶部郎中崔需、右拾遺陸淳」等實其事，顯然是機樞相似，波瀾不二。

柳文中的其他例子，如作於柳州時期的〈童區寄傳〉，³⁰「古文運動」其他作者的例子，如李翱〈高潛女碑〉。³¹又如，沈亞之〈旌故平盧軍節士文〉。³²此一方法，如果說，在上舉中唐之古文家諸文中，還是簡單的運用，其在韓愈作於元和初之名篇〈張中丞傳後敘〉中之運用，則備見複雜的層次。文中一者曰，事出張籍藏李翰原傳：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爲〈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關者。

文中二者曰，韓愈補闕，於南霽雲和張巡就義等諸事，即採用從「雙廟老人」和張籍處聽來的「如是我聞」。前者見如次：

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事，云：……。

後者復見如次：

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死時年四十九。³³

韓愈此文，通過不同敘述人之多維視角的變換，逞才把他的「如是我聞」，盡跌宕騰挪之能事，組織到古文的筆法中。試看，短短一文中，「如是我聞」竟兩次三疊，與「古文」文氣，緊密呼應，豈市街里巷之「說話」所能望其項背者乎。³⁴

如上綜述，與中唐單篇傳奇文同時的「古文家」的上述筆法，雖未必出自「晝宴夜話」，援「如是我聞」則無二。它們之間，又爲何如此之相似呢？其無疑都屬當時第一流文人作品，而不是出自民間藝人的手筆。如不是雙方

30 同上註，卷592，頁5984。

31 同上註，卷638，頁6446。

32 同上註，卷736，頁7609。

33 同上註，卷556，頁5628-5629。

34 在二十世紀的學術界，似乎從未有人論證過，「古文運動」這一文體的特點——不管是不是經傳奇文作媒介——是受「民間說話」的影響，值得注意。

同時都受到了「民間說話」的影響，那是「古文家」影響傳奇文作者，還是傳奇文作者影響「古文家」？或者，兩者同時受到了某一個「第三者」的影響？

根源在史筆。放在中唐思想史的文化環境中看，中唐傳奇文中的這一種「如是我聞」的外部結構，更像是出自於《史記》的筆法，而所謂的「晝宴夜話」，或只是圈內文人的一種集體「託詞」。容從《史記》中試舉一例，請看《史記》〈刺客列傳〉的末尾：

太史公曰：「世言荊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又言荊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遊，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³⁵

那不正是在中唐的「古文」和傳奇文中所見的「如是我聞」嗎？試看其中的傳承脈絡：戰國與西漢相去未遠，司馬遷得故事於董生，董生得故事於夏無且，而夏無且不是別人，正是當日在殿上，荊軻刺秦王之時，以藥囊救主的御醫，實在是一種史家之介入對「新聞」的回憶性搶救。

眾所周知，《史記》在唐前的地位，總體上明顯要低於《漢書》。³⁶ 貫穿唐代的學術史與思想史有同步發展，尤其中唐的古文運動前後，各方面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其中的一項內容，是對史學經典的重判。《史記》和《漢書》易位，正是這一次重判的結果——經過了再排座次，《史記》全面越過了《漢書》，成為正史的最高典範。《史記》史筆與《漢書》史筆之不同，當然是多方面的，但至少其中的一個方面，乃《史記》是「發憤著書」，「為時、為世」而作的「才子書」，而《漢書》則是嚴謹而規矩的史家之書。宗《史》宗《漢》，代表了兩種完全不一樣的史學態度。時至中唐，宗《史》的力量，已經遠越宗《漢》，成為主流。雖然，中唐這一史學經典重排座次的過程，有很多在文化身分和社會地位諸方面層次有差的人物參與，情形固然非常複雜，然而韓愈及以其為首的「古文運動」，也在這複雜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當無疑義。³⁷ 與「古文運動」相關聯，中唐傳奇文，自也受這一股

35 漢·司馬遷，《史記》（香港：中華書局，1969標點本），第8冊，卷86，頁2538。

36 漢唐間《史》、《漢》沉浮之概況，參楊海暉，《漢唐《史記》研究論稿》（濟南：齊魯書社，2003）。

37 胡應麟下列說法有代表性：「《史》、《漢》二書，魏晉以遷紛無定說，為班左袒蓋十七焉。」

「史」學觀念的時代思潮籠罩。凡此種種，對上述相似，提供了初步解釋。

所謂的「晝宴夜話」，或只是圈內文人的一種集體「託詞」，此說並不是試圖抹煞這一個事實：「晝宴夜話」的本身，就是「說話」的一種。相反，這種特殊的「說話」形式的引入，與其說是為標榜「出自民間」，不如說是用以暗示，其來源有自，出於《史記》的筆法。循上例可知，與《漢書》之「史筆」不同，在於《史記》之「史筆」中，「說話」——或者更確切地說，「口傳史料」——的運用，是一個有機的組成部分。³⁸ 另一旁證是，魏晉南北朝之後，從初唐開始，唐人承《三國志》而下，修前代之史，凡《晉書》、《梁書》、《陳書》、《隋書》、《周書》、《北齊書》、《北史》、《南史》八種，前六部法《漢書》而為斷代之史，後兩部法《史記》而為通史。³⁹ 其間「史筆」之區別，當為唐人所熟知。關於此點，日本學者有取《梁書》與《南史》梁諸王傳中所載之事蹟，比勘對照，發現《南史》較《梁書》詳盡多多之原因，在其多取當時人之「說話」入史，乃法《史記》而非《漢書》之範型（model）耳，正可從旁說明問題，以證見唐人——至少初唐所修各史的著者與「隱含讀者」——對《史記》徵「口傳史料」之法度，默然於心。⁴⁰ 也就是說，在唐人視野中，「說話」與文字，並不對立，甚至在很大的程度上，不分雅俗，與五四之後二十世紀的知識界預設，有頗大區別。⁴¹

歷史是昨天的現實，現實是明天的歷史。在中唐和晚唐文人的心目中，時政和歷史，往往有密切關聯，正因為如此，文人從時政出發，重視史筆，

唐自韓、柳始一頌子長，孟堅稍詘。……唐以前作史者，專精於史，以文為史之餘波；唐以後能文者汜濫於文，以史為文之一體。」參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上海：上海書店，2001標點本），卷13，頁131。

38 《史記》中採「說話」，早為異域學者所注意。關於《史記》中的「史筆」與「說話」，參（日）高橋稔，《〈史記〉と歴史語りについて》，《竹內晃先生退官記念東アジア文化論叢》（東京：汲古書院，1991），頁33-48。

39 《北史》〈序傳〉稱其體例「擬司馬遷《史記》」，參唐·李延壽，《北史》（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標點本），卷100，頁3345。

40 參（日）榎本あゆち，《〈南史〉の說話の要素について——梁諸王伝をてがかりとして》，《東洋學報》70.3-4(1989): 131-163。

41 我們必須要注意到，上述的種種分析和推論，都是現代學術界——即五四以後的學術界——的看法，受到了白話文運動的影響，假定了「口傳文學」的優越性，而唐人是沒有這一種觀念的。參陳珏，《初唐傳奇文鈞沉》，頁1-8。

此時也達到了一個有豐富的特定內容的新階段。魯迅有一個很精到的論點，即傳奇文降至宋，始迴避時事。也就是說，唐代的傳奇文，是一種有時事介入的虛構文體。⁴²此現象，以中唐為甚。白居易與元稹書中有「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云云，韓愈也有所謂「物不得其平則鳴」之說，⁴³說的雖然是詩歌和古文，非關傳奇文，與上述潮流，卻不謀而合。中唐古文家的「如是我聞」和中唐傳奇文的「如是我聞」，與其說是出於當時的「口傳文化」的影響，毋寧說是出自《史記》的史筆，而同時與上述貞元、元和之際的整個中唐的思想史變化的洶湧潮流，息息相關。於此再舉一例，用柳宗元的「夫子自道」，來說明問題。柳宗元在〈與史官韓愈致段秀實太尉逸事書〉中，針對本節中所舉的第一個中唐古文的例子〈段太尉逸事狀〉，自承云：

太史遷言荊軻徵夏無且，言大將軍徵蘇建，言留侯徵畫容貌。今孤囚賤辱，雖不及無且、建等，然比畫工傳者容貌尚差勝。春秋傳所謂傳信傳著，雖孔子亦猶是也。竊自以為信且著。其逸事有狀。不宣。⁴⁴

連其所援之「太史遷言荊軻徵夏無且」之例，與本節上文，討論中唐傳奇文的「如是我聞」的筆法，源於《史記》之例亦同，其筆法之源於《史記》，應無疑義。無怪乎，李肇《國史補》論韓愈〈毛穎傳〉和沈既濟〈枕中記〉，稱：「不下史遷，二篇真良史才也」，正可見中唐、晚唐之際，無論「古文」和傳奇文，其上品者，均能以史筆稱，而其「史筆」，無論今人看去有「口傳」之俗，或「文人」之雅，法《史記》則一矣。

本節以上的種種分析，從「晝宴夜話」說入手，連接到趙彥衛說中的「史才」一項，聚焦於「古文運動」，展開研究。下節則要繼續返回到趙說中的另外兩項——「詩筆」和「議論」——與「古文運動」的潛在關係，以觀察此一模式在中唐傳奇文研究中的特殊意義。

42 不僅是中唐傳奇文不迴避時事，中唐之歌詩亦然，洪邁《容齋續筆》〈唐詩無避諱〉條稱：「唐人歌詩，其於先世及當時事，直辭寄詠，略無避隱。……如白樂天長恨歌諷諫諸章，元微之連昌宮詞，始末皆為明皇而發。」見宋·洪邁，《容齋隨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標點本），卷2，頁236。與魯迅此說，正相對應。

43 見唐·韓愈，〈送孟東野序〉，見《全唐文》，卷555，頁5612。

44 見《全唐文》，卷574，頁5798。

其次，必須指出，趙彥衛的「史才、詩筆、議論」說，之所以受二十世紀的學術界重視，與陳寅恪的推重不倦，十分有關。陳寅恪在《元白詩箋證稿》中曾詳細考察了這個問題，其下列論述，最能概括說明問題的焦點：

是故唐代貞元元和間之小說，乃一種新文體，不獨流行當時，復更輾轉為後來所則效，本與唐代古文同一原起及體製也。唐代舉人之以備具眾體之小說之文求知於主司，即與以古文詩什投獻者無異。元稹李紳鶯鶯傳及歌於貞元時，白居易與陳鴻撰長恨歌及傳於元和時，雖非如趙氏所言是舉人投獻主司之作品，但實為貞元元和間新興之文體。此種文體之興起與古文運動有密切關係，其優點在便於創造，而其特徵則尤在備具眾體也。⁴⁵

上引段落雖不長，但點到了一系列複雜的問題，內容豐富，爭議不斷，此處不可能全面分析。為了方便，結合下節的研究重點，提出兩點來作初步討論。第一，陳寅恪點出了中唐小說——亦即傳奇文——有兩個作者的系統，一系與韓愈有關，一系與元白有關。第二，無論何系，均與「古文運動」有密切關係。⁴⁶ 凡此兩點，看似平淡，實與解開中唐傳奇文的生成謎團，有極為密切的牽涉。⁴⁷

上列第一點，實際開啓了二十世紀的中唐傳奇文研究中的一大理論——即所謂「韓愈集團與白居易集團」說——的先聲。⁴⁸ 眾所周知，二十世紀的文學史家，觀察到唐代文士總體來說有「集團化」傾向，但進一步把中唐傳

45 見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北京：三聯書店，2001），頁4。

46 陳寅恪的理論和其他任何人的理論一樣，當然也會有反對者，如黃雲眉，〈讀陳寅恪先生論韓愈〉，原載《文史哲》1955.8: 23-36，後收入黃雲眉，《韓愈柳宗元文學評價》（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57），頁67-100。

47 唐人傳奇文作者之有集團說，始於通過出身的統計而提出所謂的「進士集團」說，如馮沅君作於1948年的〈唐傳奇作者身份的估計〉，即認為傳奇文的撰著，與中唐的進士階層有關係，見馮沅君，〈唐傳奇作者身份的估計〉，《馮沅君古典文學論文集》（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9），頁299-310。約略同時，劉開榮在《唐代小說研究》（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中，力主傳奇文的「進士集團」說，晚近則有程千帆，《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等等，結合行卷等具體問題，深入闡發。如果說，「進士集團」說的範圍最大，為唐人傳奇文的集團說之第一圈，那麼韓愈和白居易集團說範圍較小，為唐人傳奇文的集團說之第二圈。除了這兩個學術界承認的圈子外，還有第三個範圍更小的圈子，乃是以地域劃分的隴右傳奇文集團和吳郡傳奇文集團，問題複雜，容另文詳論。

48 以〈鶯鶯傳〉、〈長恨歌傳〉為中心，中唐傳奇文的元、白集團說，為學術界耳熟能詳。然而，韓愈集團之背景的來龍去脈，少有人詳論，很值得稍加論考，以見來源。

奇文的作者，細分為若干集團者，則是個有待論證的學術現象。⁴⁹ 有關該理論的討論，幾十年來，忽冷忽熱，此起彼伏，至上世紀末，學術界又舊說重提，重新討論中唐傳奇文的「韓愈集團與白居易集團」說。追根溯源，所謂的韓愈集團說之所本，實出自陳寅恪在三十年代所撰“Han Yu and the Tang Novel”一文，⁵⁰ 而至白居易集團之所本，亦出自陳寅恪四十年代的名作〈長恨歌傳箋證〉。⁵¹

四、「文備眾體」與「異質化」

按照陳寅恪的意見，趙彥衛所謂的「文備眾體」是中唐傳奇文的一大特點。

這裏要討論的是，在某種意義上說，這些特色也大量折射在「古文」作品中，甚至有時候出現在詩歌中，使「文備眾體」不再是一個評判傳奇文的文類公式，而成爲研究中唐文體互滲的一個座標。如上節所述，中唐傳奇文的「史才」，有以「如是我聞」爲外部結構的格式，而中唐「古文家」的作品裏，也有同樣的筆墨。本節中要討論的是，中唐傳奇文中的「議論」，也同樣見之於「韓柳輩的高文」，顯然是「古文家」一種常用的「載道」工具，文章末尾均抒發議論。容舉四例，略見脈絡。其一，柳宗元之〈童區寄傳〉。⁵² 其二，如柳宗元之〈河間傳〉。⁵³ 其三，如韓愈之〈毛穎傳〉。⁵⁴ 其四，如李翱

49 唐代士風中的朋黨論，是中唐傳奇文集體說的歷史背景。較早從整體角度，研究唐代士風中朋黨現象者，見臺靜農，〈唐代士風與文學〉，原載《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14 (1965): 1-14，後收入《靜農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9)，頁105-118。

50 參Y.W. Ma (馬幼垣)，“Prose Writings of Han Yü and Ch'uan-ch'i Literature,”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7.1 (1969): 195-220.

51 在研究唐代的文學集團時，應注意到，在政治層面，關隴、山東、江左等三大集團的理論，亦成就於陳寅恪。近年在唐代文學的研究中有廣泛運用，如杜曉勤，《初盛唐詩歌的文化闡釋》(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和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學士族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2)，皆本於此。而以文學集團施之於唐前者，可參胡大雷，《中古文學集團》(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等。凡此種種，實為討論傳奇文集體問題的必要背景。

52 見《全唐文》，卷592，頁5984。

53 參唐·柳宗元，《柳宗元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頁414。

54 見《全唐文》，卷567，頁5739。

之〈題燕太子丹傳後〉。⁵⁵ 由此可見，就外部的結構而言，中唐古文家筆下的「議論」，與中唐傳奇文中之「議論」，何其相似，驟讀之下，難分彼此。⁵⁶ 自漢至唐前，這種「議論」，常常是傳的史筆的一部分，在列傳之未有之，在雜傳之未有之，在碑傳之末亦有之。⁵⁷ 以碑傳為例，劉勰《文心雕龍》〈誄碑〉概括它的體例曰：

夫屬碑之體，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標序盛德，必見清風之華，昭紀鴻懿，必見峻偉之烈，此碑之制也。⁵⁸

此非「史筆」加「議論」乎？若單就文體而言，其差異之一，也許是傳統的碑傳文之銘，例為四言之韻文，而「古文家」之作品，例多散體，至於傳奇文之「議論」，則介乎韻文與散體之間耳。綜上所述，似乎可以說，「古文家」之有「史才」和「議論」，與傳奇家之有「史才」和「議論」，非常接近，若僅就文體而言，尙難以區分。

讓我們再看趙彥衛「史才、詩筆、議論」的模式中還沒有討論的一項：「詩筆」。此問題密切關聯到韓、柳、元、白的「古文運動」和「新樂府運動」。⁵⁹

小說中有詩，不自唐人始，亦不自傳奇文始。至少，魏晉南北朝即有此

55 同上註，卷638，頁6444-6445。

56 中唐傳奇文中的議論，可以《南柯太守傳》為代表：「雖稽神語怪，事涉非經，而竊位著生，冀將為戒。後之君子，幸以南柯為偶然，無以名位驕於天壤間云」。較之於古文家議論，精神實同。在研究中唐古文家筆下的「議論」，與中唐傳奇文中之「議論」的關係時，尤值得注意的是，在「古文家」不同文類的作品中，「議論」占甚大比重，如此引之李翱〈題燕太子丹傳後〉，全文均係「議論」，以配合所題傳之「史才」。又，柳文中之〈永州鐵爐步志〉、〈永州韋使君新堂記〉等，「議論」份量亦相當多，見《全唐文》，卷580，頁5863-5864及卷581，頁5869。

57 整體而言，中唐的碑傳文與傳奇文之錯綜複雜的關係，尤受學術界注意，參臺靜農，〈論碑傳文與傳奇文〉，《傳記文學》4(1964.3): 4-6。不僅如此，在碑傳文體的內部，六朝碑傳文與中唐碑傳文之間的關係，亦是學術界的討論課題，例如庾信〈太尉庾亮碑〉、〈司空庾冰碑〉與韓愈〈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河東薛君墓誌銘〉的比較，均與「史」、「詩」、「論」的異質文體的份量與組成有涉，參（日）原田直枝，〈庾信的碑傳文〉，《中國文學報》53(1996): 52-89。

58 周振甫，《文心雕龍注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頁128。

59 中唐的歷史世界和文學世界，均極複雜。韓、白文學主張和政治上與中唐各朋黨集團的聯繫，自迥然有異，但「古文運動」和「新樂府運動」，卻息息相關。

風，《搜神記》與《世說新語》中的例子不少，自不待言。甚至在著者和時代不明的《穆天子傳》中，亦有佳例。且看西王母贈穆王詩，何等雋永，較唐人亦不遑多讓：

白雲在天，山隊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⁶⁰

然而，中唐傳奇文中的詩歌比例之大，在敘事中的地位之有機，於藝術上之成功，與當時之文化思潮——如「古文運動」和「新樂府運動」——關聯之複雜，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同時，由於中唐傳奇文中的「詩筆」問題很複雜，則現代視野的學術研究，尚遠遠不能窮盡其範圍，而其中闡釋最具慧眼，不同常人者，又是陳寅恪，從他對李紳〈鶯鶯歌〉與元稹〈鶯鶯傳〉，白居易〈長恨歌〉與陳鴻〈長恨歌傳〉之間關係的解釋，可見一斑：

陳氏之長恨歌傳與白氏之長恨歌非通常序文與本詩之關係，而為一不可分離之共同機構。……

長恨歌及傳之作成在鶯鶯歌及傳作成之後，其傳文即相當於鶯鶯傳文，歌詞即相當於鶯鶯歌詞及會真等詩，是其因襲相同之點也。……就文章體裁演進之點言之，則長恨歌者，雖從一完整機構之小說，即長恨歌及傳中分出別行，為世人所習誦，久已忘其與傳文本屬一體。⁶¹

一般人之理解趙彥衛的「史才、詩筆、議論」說，乃意謂中唐傳奇文各篇什中，內部常同時含有「文備眾體」的「史才、詩筆、議論」三因素，⁶²而陳寅恪則拓寬一步，認為此說，在特定的情況下——如〈鶯鶯歌〉與〈鶯鶯傳〉，〈長恨歌〉與〈長恨歌傳〉——可以理解為中唐傳奇文與歌行聯體的一種跨文類和跨篇章的模式。⁶³此解固有發人之未發的洞見力量，⁶⁴但陳寅恪

60 參鄭傑文，《穆天子傳通解》（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1992），頁52。

61 見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4、10。

62 關於唐代傳奇文中詩歌運用的基本類型的研究，奠基者為汪辟疆作於1931年之〈唐人小說在文學上之地位〉，《汪辟疆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頁603-616。後來的研究，參王運熙、楊明，〈唐代詩歌與小說的關係〉，《文學遺產》1983.1: 30-40；程毅中，〈唐宋傳奇本事歌行拾零〉，《文學評論》1978.3: 75；及氏著，〈唐詩與唐代小說〉，白化文編，《周紹良先生欣開九秩慶壽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318-322等等。

63 陳寅恪指出這一點後，學術界對此開始有所注意，以〈鶯鶯歌〉與〈鶯鶯傳〉為例，人們既可見〈鶯鶯傳〉內部常同時含有「文備眾體」的「史才、詩筆、議論」三因素，同時又見〈鶯鶯歌〉與〈鶯鶯傳〉作為中唐傳奇文和歌行聯體的一種跨文類和跨篇章的模式，而兼三因素。有關分析，參James R. Hightower, "Yuan Chen and 'The Story of Ying-

並未止步於此。他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甚至認為「史才、詩筆、議論」的「文備衆體」，不僅存在於傳奇文之中，也可單獨存在於中唐元、白歌行體的某一詩篇中。他所舉出的典型，是元稹的〈連昌宮詞〉：

至若元微之之連昌宮詞，則雖深受長恨歌之影響，然已更進一步，脫離備具眾體詩文合併之當日小說體裁，而成一新體，俾史才詩筆議論諸體皆彙集融貫於一詩之中，（其詳俟於論連昌宮詞章述之。）使之自成一獨立完整之機構矣。此固微之天才學力之所致，然實亦受樂天新樂府體裁之暗示而有所摹仿。故樂天於「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之句及自注「元九向江陵日，嘗以拙作一軸贈行，自後格變。」「李二十嘗自負歌行，近見吾樂府五十首，默然心伏。」之語明白言之，世之治文學史者可無疑矣。⁶⁵

這是對趙彥衛「史才、詩筆、議論」之說的一個創造性和顛覆性的闡釋，惜乎極少為五十多年來研究傳奇文的學者所注意。如果此說能成立，那麼「史筆、詩才、議論」的模式，廣泛為貞元與元和間的各文學革新流派——包括韓柳元白及其追隨者——所共用，存在於傳奇文之中，存在於「古文」之中，也存在於詩歌之中，與其說是一個文體意義上的模式，不如說是一個思想史意義上的模式。⁶⁶ 這個模式，跨越當時的各種文體而存在，不僅不能作劃分中唐古文和傳奇文的分水嶺，甚至不能作劃分中唐的古文、傳奇文和歌

Ying,”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33 (1973): 90-123.

64 唯洞見必引起爭論，而爭論方澄清洞見。陳寅恪此說一出，四十年代即有夏承燾〈讀長恨歌——兼評陳寅恪教授之箋證〉一文商榷。後來，羅聯添撰〈長恨歌與長恨歌傳的「共同機構」問題〉，作詳細討論，駁難陳說，言深有據，原載1985年出版《傅樂成教授紀念論文集——中國史論集》，後又收入羅聯添，《唐代文學論集》下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頁521-538。夏、吳、羅三家之代表性駁難，均有根據和道理，因為陳寅恪提出的問題非常複雜，不可能沒有漏洞，故若從另一角度來理解，以其為今後進一步補足陳寅恪洞見中之漏洞（而非推翻其洞見之基本出發點）努力之先導，亦未嘗不可，並深具意義。

65 見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11。

66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在研究中唐文化史背景下的中唐詩歌與小說時，曾聯繫到西方文學理論中的兩個傾向——一方面強調各文類都有其自外於其他文類的特徵與規律，另一方面強調在特定的時代幾乎所有文類都有共用該時代精神所賦予的歷史共同點。他舉出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小說理論作前者的例子，新歷史主義（New Historicism）和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界的歷史轉向為後者的例子。此說似正好可為此處的註解，參 Stephen Owen, *The End of the Chinese “Middle Ag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

行的分水嶺，因為它根本就不是一個用來劃分文類的模式。⁶⁷

上述的中唐各文學革新流派的基本關懷——無論是「古文運動」的「尊王攘夷」，還是「新樂府運動」的「為君為民」——都不僅是文學問題，而是思想史問題，固為稍熟唐代文史者所能詳。從這一點推展，如我們接受陳寅恪的精彩洞見，把「史才、詩筆、議論」的模式，視為在貞元與元和間，為韓柳元白及其追隨者，進行各自文類不同的文學革新時，經常部分或全部採用的三個互相有關聯的要素，而不把它視為一個用以規範中唐傳奇文的公式，則會有另開途徑的思路。換言之，從以上各節的分析出發，把「晝宴夜話」的「如是我聞」結構，也看成是中唐傳奇文中特殊的「史才」的一部分，來理解「史才、詩筆、議論」說，會導致一個新的研究視角。若，按照趙彥衛的說法，該文類有一種類似鏡子的功能，讀者可從作品中，看出作者「史才」之高下，「詩筆」之疏嚴，乃至「議論」之深淺。人們知道，時至中唐以前從沒有這種文體在讀者面前出現過。面對這一新的文體，人們會問：這種文體又如何把「史才」、「詩筆」和「議論」三個大要素組織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呢？顧名思義，「史才、詩筆、議論」模式乃是強調指稱，傳奇文作為一種敘事文類，其最大特點是諸文類的混合，是中國小說史上第一次出現成熟的「異質化」敘事現象。⁶⁸

67 如果我們循陳寅恪的思路，略瀏覽中唐的歌行，就會發現，〈連昌宮詞〉這個典型的「史才、詩筆、議論」三因素俱全的例子，雖然罕見，但其他兼有「史才」和「詩筆」之兩項者，比比皆是。例如，張籍〈傷歌行〉之以「詩筆」含「史才」，甚顯而易見，參（日）丸山茂，〈張籍〈傷歌行〉とその背景——京兆尹楊憑左遷事件〉，《東方學》63(1982): 73-88。再反過來看，本文上節中排列若干的例證，說明古文中「史筆」的外部結構，與傳奇文中「史筆」的外部結構，有一致的地方。本節中又援引若干的例證，說明古文中「議論」的外部結構，與傳奇文中「議論」的外部結構，有一致的地方。如此則古文較之傳奇文，似乎同有「史才」和「議論」，唯常缺「詩筆」。這與歌行較之傳奇文，常共具「史才」和「詩筆」，唯常缺「議論」，相映成趣，益可見「史才、詩筆、議論」說，並不能劃分古文、歌行和傳奇文的文類特徵。

68 這種「異質化」的過程，就韻文與散文的分別與結合而言，在六朝即是一個問題，「謝玄暉善為詩，任彥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云云，即為一例（後簡化為「任筆沈詩」，所謂的「詩中有筆，筆中有詩」，循此而來。）參唐·李延壽，《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標點本），卷57，頁1413。而「文」與「筆」在六朝的關係，又與佛教影響相連甚密，自不待言，乃至今人解此題，亦有用後來日僧空海《文鏡秘府論》、了尊《悉曇輪略圖鈔》者，參王利器，〈文筆新解〉，九州大學中國文學會，《中國文學論集》14(1985): 1-11。至於在

這樣的文類特點，使人聯繫到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在歐洲小說理論中的orchestrated heteroglossia和hybrid construction兩個觀念，研究素材中各種異質的文類片斷——如寓言、逸事、醜聞、玩笑和詩歌——如何整合成一部完整的小說。⁶⁹在歐洲的長篇小說中，這種「異質化」敘事混合的成熟，有待十七世紀《唐·吉珂德》的出現，而為西方虛構敘事文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文類空間。從比較文學的角度，正與十六世紀明代之四大奇書，相映成趣。胡適曾經有一極精彩的論斷，久為研究舊小說史者所忽視：

古文不曾做過長篇的小說，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一百多種長篇的小說。古文裡有很少滑稽的風味，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歐文和狄更司的作品。古文不長於寫情，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茶花女》與《迦因小傳》等書。古文的應用，自司馬遷以來，從沒有這種大的成績。⁷⁰

足見「古文」之「文備眾體」，自有與歐洲的長篇小說相類似的「異質化」敘事混合的能力，惜乎明清之舊小說，未朝此方向發展耳。而這種「異質化」混合在中國小說中的成熟，無疑在中唐傳奇文。有鑑於此，可見「史才、詩筆、議論」的模式，不是公式，更非押韻和平仄的格律，需作超脫文體學本身的研究。換言之，在中唐傳奇文的研究中，「史才、詩筆、議論」說的重要性，在於它提供了一個範圍適中的座標，而不是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公式」。這個座標，引導我們以「異質化」為出發點，去分析傳奇文在中唐之成型，在中國舊小說史上的潛在意義。

中唐傳奇文這一「異質化」的個案中，「史」、「詩」、「論」各項之入選，亦非偶然，而與當時之風尚，息息相關。白居易〈與元九書〉自承云：「日者又聞親友間說，禮吏部舉選人，多以僕私試賦、判、傳為準的」，見《全唐文》，卷675，頁6890。劉開榮對此闡釋極具陳門風範，曰：「所謂賦即詩筆，判為議論，傳即史才也。足見當時古文家所操縱的文壇的趨向，是敘事文、議論文和詩詞。」見劉開榮，《唐代小說研究》，頁35。

69 參 Mikhail Bakhtin, *The Dialogical Imagination*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1), pp. 3-40, 259-422; 及 Victor Shklovsky, *Theory of Prose* (Elmwood Park: Delkey Archive Press, 1991), pp. 72-100.

70 見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上海：申報館，1924）。

五、「寓意」說

承接上節，本節把這個模式放在中唐的文化史潮流中觀察，討論其在傳奇文成型中的作用，在於與「寓意」的結合。

中唐是一個充滿了文體實驗的時代。同時，如前所述，中唐的知識份子，對歷史和時事的交叉，十分敏感。這種敏感，滲透到當時的各種文體——不僅包括敘事文，甚至也包括歌行——的實驗中來。上文已談到，「古文運動」中的佳作，常需「史才」和「議論」；「新樂府」中的佳作，常需「史才」和「詩筆」；傳奇文中的佳作，「史才」、「詩筆」和「議論」，則有時缺一不可。這裏的「史才」、「詩筆」和「議論」，反映的無非就是上述的敏感。

與此相關，在本節中，要討論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即在這種同樣的敏感支配下，中唐又是一個在傳記體（與「古文」和傳奇文有交叉的文類關係）方面，充滿了實驗的時代。⁷¹「傳」體的各個亞文類，如小傳、家傳、外傳、自傳、別傳、行狀、墓誌、碑銘等等，固成型於唐前，但在中唐卻無不經歷了一系列推陳出新的實驗，⁷²這些傳體的亞文類撰著，也常需「史才」和「議論」，有時候甚至還需要「詩筆」。

「記」體作為一文類，為先唐之主流文章辨體者所不注意，顯然當時尚不是一個獨立的文類。⁷³它成熟於唐人之手，到了北宋編《文苑英華》之時，它的各個亞文類，不僅有樓記、城記、觀記、遊記、夢記、圖畫記、風土記、拾遺記之門，並且有寓言和雜記之類，變化多端，蔚為大觀，既有「古文家」之記，又有傳奇文之記。雖然不如傳那麼明顯，但其中之「史才」與「議論」，亦時時可見，有時候也需要「詩筆」。明人吳訥〈文章辨體序說〉

71 參（韓）南宗鎮，〈唐代文人所撰短篇人物傳之發展成因初探〉，《陝西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9.2 (2000): 123-129。

72 參李一飛，〈中唐傳記文學鳥瞰〉，《文學遺產》1992.1: 59-67。

73 值得注意的是從魏晉南北朝到唐，是各種「傳」與「記」的體裁實驗的階段，與小說中的志怪和傳奇文的發展，關係密切。參王國良，〈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劉苑如，〈雜傳體志怪與史傳的關係——從文類觀念所作的考察〉，《中國文哲研究集刊》8(1996): 365-400。

指出：「記之文，《文選》弗載。後之作者，固以韓退之〈畫記〉、柳子厚遊山諸記爲體之正。……至柳之記新堂、鐵爐步，則議論之辭多矣。」⁷⁴即爲明證。

如何區分傳奇文之「傳」和「記」與中唐其他敘事文——主要在各類「古文」中——之「傳」和「記」？正像「史才、詩筆、議論」說不能夠作爲一種公式來劃分上文中談到的歌行和傳奇文的特質一樣，它也無法劃分我們在這裏提出的文類區別。然而，人們研究中唐的「古文」和傳奇文，常說某篇某篇是「古文」中之「傳」之「記」，而某篇某篇則是傳奇文中之「傳」之「記」，據何以分呢？

雖然，陳寅恪提出的融會「古文運動」與中唐傳奇文崛起的研究構想，始終是一個極具有生命力的學術方向，但陳寅恪本人並沒有正面接觸上述這一個關鍵的問題。二十世紀後半葉的學術界，處理這一個問題的方法，基本上是回到魯迅《唐宋傳奇集》和汪辟疆《唐人小說》這兩部選本中的「經典書單」，來作判斷，亦即凡《唐宋傳奇集》和《唐人小說》中榜上有名者，多爲傳奇文，無名者，則多爲「古文」中之「傳」、「記」體。從這個意義上說，雖然陳寅恪認爲韓愈的〈石鼎聯句詩序〉應當爲中唐傳奇文之說，在學術界被相當一部分人接受，但陳寅恪所出之題——即中唐韓、柳「古文家」參與中唐傳奇文之成型過程的預設，以及這一個預設必然會引起對魯迅和汪辟疆「經典書單」的補充和修正——卻沒有受到正面的回應，而是被輕輕「繞」過了。

直到本世紀，卞孝萱在總結其「文史互證」方法研究傳奇文的時候，明確提出了「寓意」說之時，局面方有實質性的變化。此說中心是：有無「寓意」，是劃分唐代傳奇文與非傳奇文類的各種「傳」、「記」——包括雜傳、雜文和軼事等在內——的界線。也就是說，「寓意」和「影射」，是中唐政治與傳奇文成熟的關鍵交叉點之一。⁷⁵卞孝萱在〈怎樣鑒別唐傳奇有無寓意？〉一文中，通過分析同一本事——貞元元和間一個女報父仇的故事——在崔篆

74 明·吳訥等著，《文體序說三種》（臺北：大安出版社，1998），頁52。

75 關於「影射」在中古時代文化史上的發展脈絡和重要性，參Jue Chen, “‘Shooting Sand at People’s Shadow’: Yingshe as a Mode of Representation in Medieval Chinese Literature,” *Monumenta Serica* 47 (1999): 169-207.

〈義激〉、李肇《唐國史補》〈妾報父冤事〉、薛用弱《集異記》〈賈人妻〉和皇甫氏《元化記》〈崔慎思〉四種記載中的不同表現，得出結論：

一個女報父仇的故事，見於五種記載，是值得注意的。從這個典型例子，不但可以看出唐人雜傳、雜文、軼事、傳奇四種文體創作手法之異同；更重要的是，通過比較研究，只有〈義激〉有寓意，其他各篇無寓意，因為只有崔篆有家難，其他各篇作者無家難。進入作者心胸，才能鑒別作品有無寓意。⁷⁶

卞孝萱所用的四個例子，雖然為晚唐之作，但其所主之「寓意」說，卻貫穿於唐代傳奇文的整體，從而清晰劃出了中唐傳奇文中的「傳」與「記」和同期「古文家」筆下普通無寓意的「傳」與「記」的區別，儘管它們間往往會共用「史才」、「詩筆」和「議論」模式中的一項、兩項或三項。正因為如此，卞孝萱之「寓意」說的明確提出，是本世紀唐人傳奇文研究的一個關鍵進展。這個重要的洞見，對於用現代學術的方法，界定中唐傳奇文的界限，乃至探討傳奇文的定義，深具有承先啓後的意義。

其意義之一，是卞說從理論角度，溝通了魯迅、汪辟疆「經典書單」的系統，與陳寅恪「經典書單」的系統。⁷⁷ 上文談到，陳寅恪舉韓愈〈石鼎聯句詩序〉為傳奇文，修改了魯迅與汪辟疆的「經典書單」，但未從理論上進行駁難。這裏，值得進一步注意的是，陳寅恪雖以〈毛穎傳〉為「小說」，未直呼其為傳奇文，但是在論述中唐傳奇文與韓愈的關係時，每每涉及〈毛穎傳〉，給予極大的注意。顯而易見，陳寅恪的這個立場，與魯迅所認為傳奇文判然有別於「韓柳輩」高文的說法，大異其趣。以此為背景，陳寅恪這裏的用語謹慎，或非無因——〈毛穎傳〉筆法，與中唐其他傳奇文迥然有異，乃至學術界一般都認為，這乃是一篇「託傳」體小說，而不是一篇傳奇體小說。如要面對上述主流的觀念，加以修正，非全面檢視傳奇文在中唐的發展，並與「古文運動」中出現的「託傳」體小說進行比勘不可，⁷⁸ 這顯然不

76 參卞孝萱，《唐傳奇新探》（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頁368-375。

77 關於「經典化」的重要性，見陳珏，《初唐傳奇文鈞沉》，頁37-39。

78 「託傳」研究，頗受漢學界重視，一般認為是中國文學中類似西方的「模擬諷喻體」（parody）的作品，參Herbert Franke（福赫伯，又譯傅海波），“A Note on Parody in Chinese Traditional Literature,” *Oriens Extremus* 18.2 (1971): 237-251以及Herbert

是《元白詩箋證稿》一書的主旨所在，甚至也不是該書篇幅所能夠包容的。⁷⁹

卞孝萱的這張書單，實際上溝通了魯迅、汪辟疆「經典書單」與陳寅恪「經典書單」，它拓寬了中唐傳奇文概念的範圍，符合當時傳奇文崛起與「古文運動」勃興的錯綜複雜的文化史背景。而最關鍵的一點，是指出「寓意」是傳奇文結綴各種「異質化」的文類碎片的粘合劑，使之不同於當時形形色色的各種古文和詩歌體的敘事作品。⁸⁰

「寓意」之與「異質化」結合，是中唐傳奇文成型的交會之點，而其中關鍵，則在於一系列特殊章法的浮現。

六、新的出發點

綜上所述，中唐傳奇文的成型，其關鍵之一在「文備衆體」的「異質化」敘事現象，通過一系列特殊的章法，織成了一張「寓意」之網。

這個「異質化」過程完成於中唐，形成了一整套的章法，可以揭示其內部的結構，是理解初唐傳奇文與中唐傳奇文異同的關鍵，也是理解傳奇文與非傳奇文區別的關鍵。唯徹底探究此章法結構的各個層次，方能在理論的層

Franke, "Literary Parod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Descriptive Pseudo-Biographies," *Oriens Extremus* 21.1 (1974): 23-31. 福赫伯此處二文，雖不以唐代為限，但均談到〈毛穎傳〉。

79 本世紀初，卞孝萱出版了《唐傳奇新探》和《唐人小說與政治》二書。以其「寓意」說為綱，該兩書中所選的討論篇目，實際上是卞孝萱心目中的一張「經典書單」。這一張「經典書單」包括了若干篇魯迅和汪辟疆的「經典書單」所不載的篇目，其中除了〈石鼎聯句詩序〉外，韓愈〈毛穎傳〉、柳宗元〈河間傳〉和〈謫龍說〉三篇「古文家」小說，赫然在焉。這三篇「古文」小說，一般都認為是「託傳」，亦即「寓意小說」而不是傳奇文。韓愈〈毛穎傳〉，自不待言。柳宗元之〈河間傳〉，在國人和西人中一般亦都認為屬「託傳」和「寓意小說」的範疇。至於〈謫龍說〉，因篇幅極短，一般都以「說」體「古文」視之，但卞孝萱歸之為傳奇文，並注意到，馬位《秋窗隨筆》中，有「柳子厚〈謫龍說〉，可補入《搜神記》」云云，參卞孝萱，《唐傳奇新探》，頁221。

80 〈石鼎聯句詩序〉外，韓愈〈毛穎傳〉、柳宗元〈河間傳〉等「古文家」小說，雖然一般人認為是「託傳」，但亦有少數學者將之列為中唐傳奇文。范文瀾雖未明言其有「傳奇文」體，但認為〈河間傳〉「幾乎類似《水滸傳》描寫潘巧雲、潘金蓮的事情」，此見多年未受人重，唯卞孝萱循此深入，參卞孝萱，《唐傳奇新探》，頁123。此處視卞孝萱「經典書單」有特殊之意義者，乃因其以「寓意」說，形成一有理有據的完整理論之故。

面界定傳奇文的定義和在實踐層面判定某一篇小說是傳奇文抑或不是傳奇文。顯而易見，章法只是中唐傳奇文的整體研究之一端，但因為這一端與中唐傳奇文的讀者、作者、作意問題都有聯繫，以此為軸心，入手來觀察初唐傳奇文和中唐傳奇文有何不同，是筆者正在作的一個初步嘗試。本文就是這個實驗的開篇，具體的計畫是從中唐單篇傳奇文的代表作中，分割出若干系列，作個案研究。在個案基礎上的綜合，深入到中唐的文化背景中，逐步接近於解答「何謂中唐的傳奇文章法特點」這個問題。

鑑往知來，一方面，上世紀二十年代魯迅和汪辟疆開始用現代學術的眼界來整理唐人傳奇文，中經陳寅恪的前瞻性和預設性的貢獻，本領域的研究已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另一方面，經過上世紀整整一世紀的學術現代化的艱苦歷程，今天的文史研究界，雖然大多數人都認同唐人傳奇文的存在，但也仍還沒有一個能普遍被大家接受的定義。回首過去的路途，本世紀催生學術界普遍能認同的唐代傳奇文定義，任重道遠，不是件一蹴而就的事情，也許要經過相當長的時間，由許多學者先作各自不同的多方面和多角度的探索，然後才能夠奏功，進行綜合。而從章法切入，對於「陳寅恪命題」作進一步深入解讀，或不失為這種研究的諸多出發點中前景誘人的取徑之一。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漢·司馬遷撰，《史記》，香港：中華書局，1969。
唐·李延壽撰，《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
唐·李延壽撰，《北史》，北京：中華書局，1983。
唐·柳宗元撰，《柳宗元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宋·洪邁撰，《容齋隨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宋·趙彥衛撰，傅根清點校，《雲麓漫鈔》，北京：中華書局，1996。
明·吳訥等著，《文體序說三種》，臺北：大安出版社，1998。
明·胡應麟撰，《少室山房筆叢》，上海：上海書店，2001。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
魯迅校錄，《唐宋傳奇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
汪辟疆編，《唐人小說》，上海：神州國光社，1932。

鄭傑文，《穆天子傳通解》，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1992。

周振甫，《文心雕龍注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二、近人論著

(日)丸山茂 1982 〈張籍《傷歌行》とその背景——京兆尹楊憑左遷事件〉，《東方學》63: 73-88。

卞孝萱 2001 《唐傳奇新探》，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王利器 1985 〈文筆新解〉，九州大學中國文學會，《中國文學論集》40: 1-11。

王國良 1984 《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王運熙、楊明 1983 〈唐代詩歌與小說的關係〉，《文學遺產》1983.1: 30-40。

王夢鷗 1973 《唐人小說研究》二集，臺北：藝文印書館。

李浩 2002 《唐代三大地域文學士族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李一飛 1992 〈中唐傳記文學鳥瞰〉，《文學遺產》1992.1: 59-67。

李宗為 2003 《唐人傳奇》，北京：中華書局。

杜曉勤 1997 《初盛唐詩歌的文化闡釋》，北京：東方出版社。

汪辟疆 1988 《汪辟疆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孟昭連 2000 〈唐傳奇「文備衆體」的藝術體制〉，《南開學報》2000.4: 62-68。

(韓)南宗鎮 2000 〈唐代文人所撰短篇人物傳之發展成因初探〉，《陝西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9.2: 123-129。

胡適 1924 《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上海：申報館。

胡大雷 1996 《中古文學集團》，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日)原田直枝 1996 〈庾信の碑傳文〉，《中國文學報》53: 52-89。

夏承燾 1949 〈讀長恨歌——兼評陳寅恪教授之箋證〉，《國文月刊》78: 8-11。

孫昌武 1984 《唐代古文運動通論》，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

(日)高橋稔 1991 〈《史記》と歴史語りについて〉，《竹内晃先生退官記念東アジア文化論叢》，東京：汲古書院，頁33-48。

陳珏 2005 《初唐傳奇文鈎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陳寅恪 2001 《元白詩箋證稿》，北京：三聯書店。

程千帆 1980 《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程毅中 1978 〈唐宋傳奇本事歌行拾零〉，《文學評論》1978.3: 75。

程毅中 1997 〈唐詩與唐代小說〉，白化文編，《周紹良先生欣開九秩慶壽文集》，北京：中華書局，頁318-322。

馮沅君 1989 《馮沅君古典文學論文集》，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

- 黃雲眉 1957 《韓愈柳宗元文學評價》，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
- 黃雲眉 1995 〈讀陳寅恪先生論韓愈〉，《文史哲》1995.8: 23-36。
- 楊海崢 2003 《漢唐《史記》研究論稿》，濟南：齊魯書社。
- 臺靜農 1964 〈論碑傳文與傳奇文〉，《傳記文學》4(1964.3): 4-6。
- 臺靜農 1965 〈唐代士風與文學〉，《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14: 1-14。
- 臺靜農 1989 《靜農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 (日) 榎本あゆち 1989 〈《南史》の説話的要素について——梁諸王伝をてがかりとして〉，《東洋學報》70.3-4: 131-163。
- 劉苑如 1996 〈雜傳體志怪與史傳的關係——從文類觀念所作的考察〉，《中國文哲研究集刊》8: 365-400。
- 劉開榮 1947 《唐代小說研究》，上海：商務印書館。
- 薛天緯 1994 〈干謁與唐代詩人心態〉，中國唐代文學學會、西北大學中文系、廣西師範大學編，《唐代文學研究》第5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頁1-16。
- 羅聯添 1985 〈長恨歌與長恨歌傳的「共同機構」問題〉，《傅樂成教授紀念論文集——中國史論集》，臺北：傅樂成教授紀念論文集委員會，頁505-520。
- 羅聯添 1989 《唐代文學論集》下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 Bakhtin, Mikhail. 1981. *The Dialogical Imagination*.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Chen, Jue. 1999. “‘Shooting Sand at People’s Shadow’: Yingshe as a Mode of Representation in Medieval Chinese Literature.” *Monumenta Serica* 47: 169-207.
- Franke, Herbert. 1971. “A Note on Parody in Chinese Traditional Literature.” *Oriens Extremus* 18.2: 237-251.
- Franke, Herbert. 1974. “Literary Parod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Descriptive Pseudo-Biographies.” *Oriens Extremus* 21.1: 23-31.
- Hightower, James R. 1973. “Yuan Chen and ‘The Story of Ying-Ying’.”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33: 90-123.
- Ma, Y.W. 1969. “Prose Writings of Han Yü and Ch’uan-ch’i Literature.”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7.1: 195-220.
- Mair, Victor. 1978. “Scroll Presentation in the T’ang Dynasty.”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38.1: 35-60.
- Owen, Stephen. 1996. *The End of the Chinese “Middle Ag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Shklovsky, Victor. 1991. *Theory of Prose*. Elmwood Park: Delkey Archive Press.

Rethinking Chen Yinke's Theories on Tang *Chuanqi* Stud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Jue Chen*

Abstract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Lu Xun's 魯迅 *Tang Song chuanqiji* 唐宋傳奇集 and Wang Pijiang's 汪辟疆 *Tangren xiaoshuo* 唐人小說 in the 1920s, *chuanqi* 傳奇 scholars have been making efforts to provide a definition for the genre. However, *chuanqi* as a genre is very difficult to define. To date, most scholars still largely rely on Lu Xun and Wang Pijiang's list of canonical works to determine whether or not a certain piece of fiction is *chuanqi*.

It would be important for scholar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o continue exploring the nature of this complex genre before a commonly accepted definition can be found. Chen Yinke's 陳寅恪 research on *chuanqi* in the 1940s and 1950s, I would argue, can be taken as the point of departure for our effort to further explore this genre.

This paper serves as a preliminary study on Chen Yinke's theory on *chuanqi*, together with other theories on the genre. The focus of my study is on Chen Yinke's interpretation of the Song dynasty scholar Zhao Yanwei's 趙彥衛 formula of *chuanqi* fiction, which emphasizes the combination of historical insight and poetic creative power with political and social criticism.

Keywords: *chuanqi* fiction, ancient style prose, Mikhail Bakhtin, Tang dynasty, Chen Yinke 陳寅恪

* Jue Chen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t 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 Xinzhu.